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左宗棠与保卫新疆



一、少年不得志

左宗棠，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洋务运动的开先河者之一。他为维护祖国独立、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湖南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所在地，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传统，曾产生过像屈原这样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湖南西部山穷水恶，民风强悍。左宗棠的家乡湘阴一带，靠近洞庭水系，河网密布，土地富庶，物产丰饶，且靠近湖南巡抚衙门之地——长沙。因此，他的家乡既沿袭了楚文化的传统，又受到沿长江内传的西学之影响，尊师重教，学风盛行，为人杰地灵之所，人才荟萃之地。

位于湘江之畔的岳麓山上著名的岳麓书院，曾培养过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名士。早在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曾在此讲过学；清朝中兴的栋梁之臣曾国藩在此读过书；就连第一个辨识左宗棠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陶澍，也在岳麓书院念过书；左宗棠的父亲，也曾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左宗棠，字季高，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左家墩一个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左观澜，廪生。廪生，就是通过童试考试合格以后，被录收入府、州、县学，但尚未取得乡试资格，只是通过了科举考试阶梯的第一关的人。他是生员的一种，生员的名称很多，但最普通、最为人们熟知的称呼，便是“秀才”。

左宗棠虽说不上家学渊源，但也算得上书香门第，家中上下均以读书为高。左宗棠和他的二哥从小学文习字，参加科举考试。

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刚满14岁，就在湘阴参加了童子考试。童子考试，是当时的读书人攀登科举考试阶梯的开始，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在院试考试中名列第一、二、三等的前10名者，才能取得乡试资格，方可进入高层次的考试即中举考试。考试那一天，湘阴县城内的大成殿前面，搭起了高高的考棚，里面摆放了几十张考桌，考棚内一片寂静无声。左宗棠屁股一落考凳，略略沉思片刻，就颇有把握地挥动起毛笔。别的应试人还在咬笔头时，左宗棠就交了头卷，跨出大厅。只见接过左宗棠考卷的考官们互相传阅，有的拈须点头，有的频频赞叹。果不其然，考榜下来，左宗棠名列榜首。

第二年，左宗棠15岁，到岳州参加了府试。相邻的两闾一老一少两位生员成了考官们关注的中心。只见那少年脸上的稚气还未完全退掉，却踌躇满志，埋头疾书。相邻的那位年长的考生，须发斑白，颇显老态。主考官为知府张锡谦，他戴着老花镜，见那少年行文如行云流水，颇感惊奇，不由探头从后面看了看那少年的文笔，心中暗暗称赞不已。考毕，张锡谦四处打听，方知那少年是湘阴的左宗棠，建议将他取作府试的头名。可其他考官说，邻闾的那位考生已经考了十几届了，年近花甲，该适当照顾照顾。这样，左宗棠得了第二名。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21岁。他同哥哥左宗植同去长沙赶考。乡试的结果，哥哥左宗植得了正榜头名，左宗棠却落入副榜。如果按考卷的成绩评定优劣，正榜的前2名本应都是左氏兄弟俩人的。谁知不知哪位考官的一句话：“这次乡试的好文章不少，自古以来楚界出人才，湖南人才济济，左姓兄弟二中取一就成了。”这样，左宗棠被拉了下来。

眼见左宗棠中举无望，恰好正考官徐法绩接到皇上的旨喻，要湖南考场再多从遗卷中选出几篇上好的佳作，以不埋没人才。徐法绩正为左宗棠的落选心中不适，便将左宗棠以“造士厉兵”为题的考卷找来让其他考官再看看，并说：“我看比他哥哥左宗植的文章不差呀！”这篇文章虽然得到其他考官们的一致赞许，但是铺在大案上的黄榜已经把前 17 名的中举者都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徐法绩只得在榜尾写下“副榜”二字，亲自写下“第十八名：左宗棠”。左宗棠总算中举了。

中了举的举人，就可以参加会试。明清两代的会试是礼部在京城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又称为“礼闈”。会试一般在乡试的次年举行。

中举之后，左宗棠立刻准备赴京赶考。可惜左宗棠在科举考试的仕途上命运乖舛，连续三次应试进士都落选了。

第一次会试，左宗棠未中。第二次会试，左宗棠被取为第十五位。左宗棠的文章本来是很好的，考场上一些胸怀大略，眼光洞达的考官曾认为左宗棠的文章言之有体，浑然成章，立意深远，是自大清立国以来少见的好文章，可以问鼎榜眼探花。可是在那清廷之风沉暮、讲求上下圆通、四平八稳的官场上，左宗棠的峥嵘头角却不被一些人赏识，便以左宗棠还年轻，怕他自视太高为名，把他取在了最后一名。可是，黄榜张上高墙时，左宗棠的名字却不见了。原来这次会试湖南中了六名，比上限还多了一名，便把左宗棠的名字刷了下来，补上湖北一名，仅把他取为誉录。誉录，相当于现在的抄写员。左宗棠不愿意、也不屑于做这个抄抄写写的工作，遂一甩袖子回到家乡。第三次会试，因左宗棠的文章谈的是经世致用、改革图新，不合当朝权贵的口味，又没有考上。

在科举考试上的磋跎，使左宗棠断了功名之心。

二、神交

左宗棠虽然从此无心仕途，但胸中的宏大志向并没有因此而湮灭。拳拳爱国之心，使左宗棠并没有放下手中的书。当年，左宗棠刚成家，较穷，寄住在湘潭辰山岳父家，在他们夫妻住的房门上，就贴着左宗棠亲笔书写的对联：“身无半品，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左宗棠关注、研究的方向有所改变。回家之后，左宗棠努力钻研史地、荒政、盐政等经世致用之学。他埋首读书，悉心研究了中华的疆域。从最早的《禹贡图国》经秦、汉、唐、宋、元、明，把历朝历代的疆域图全部翻出，一一对照，一一比较，每遇各国各朝代疆域变化时，左宗棠就拿笔详细地画下来，并在旁边写下密密麻麻的注释。山川关隘、城池险邑，分门别类地绘制，然后订成图册几十卷，笔记也洋洋洒洒几十本。同时，左宗棠还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徐松，请求徐松把当时京城的好书推荐给他，并索徐松自己所著的《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顾炎武的《郡图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也是左宗棠百看不厌的经典。还有汇萃清以来经世致用文章的《皇朝经世文编》，更是左宗棠爱不释手的书籍。他不光读，而且还作札记。几本书，圈了又圈，点了又点，还把书的主张及理论要点一一抄录下来。左宗棠对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非常叹服。不仅赞赏王船山一生坚持爱国主义的人品，而且对王船山的博学和极高的学术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王船山的名言“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弃虚崇实，以使中国日新而月有异焉”，就被左宗棠铭记在心。

左宗棠在多年的潜心苦读和研究中，虽然与仕途无缘，但其文章、思想却已至炉火纯青，日臻练达，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的名声在湖南有远见卓识的士大夫的眼中耳里，颇为著名，被视为当世奇才，颇得当时的一些大人物的垂青。

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被湖南士大夫视为“江南第一才子”，是道光年间的一位有名望有才能的官吏。他少年得志，25岁便中了进士，以后担任过许多地方的要职。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左宗棠在醴陵绿江书院当教席。这一年正巧碰上陶澍总督两江，到江西出差时路过醴陵。醴陵县令为了迎接总督大人的莅临，特意请左宗棠在陶澍住宿之地撰写对联。左宗棠挥笔而就的对联：“春殿语从客，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湖南人民对陶澍的敬仰之情和道光皇帝为陶澍幼年读书之地题写“印心石屋”匾额的莫大荣耀，博得了陶澍的大为赞赏，立刻请来左宗棠相见。

那一晚，俩人秉烛而坐，整整谈了一夜。从学问谈到家事、国事，从漕、盐之道谈到海运、国防。左宗棠积了一肚子的学问，恨不得全部倒出来。陶澍深为他的学识所倾倒。

据说，当时左宗棠拜见陶澍躬身作辑时，一不小心挂断了陶澍胸前的朝珠，珠子撒满一地。一般20多岁的人定会吓得不知所措，困窘至极。左宗棠却若无其事，没事人似的一边弯腰拣朝珠，一边和陶澍应答。就连见多识广的陶澍，也为左宗棠的胆识所震惊。他深为家乡有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才具非凡的奇才而高兴。

一位是50多岁的两江总督、朝廷重臣，一位是区区20来岁的举人，陶澍不顾自己身分、地位与左宗棠的悬殊，与他结下忘年之交。陶澍预言，左

宗棠今后的地位、成就将会在自己之上，并勉励左宗棠不要被功名所累，以致耽误自己的大好年华。陶澍说：“功业与功名这一字之差，误了多少才华之士。建业胜于功名。是真才，终有用日！”

后来，陶澍重病垂危之时，派人专程送信，把左宗棠叫到病榻前，不仅把8岁的独子陶澍托于左宗棠，并订下了儿女亲家；其他家事也托付给了左宗棠。

从陶澍与左宗棠相识，到陶澍病逝，前后不过两年光景，相交的时间可谓不长。可是俩人的相知，却胜过了许多相交十几年、几十年的老朋友。由此可见，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的陶澍，对才气非凡的左宗棠高度赞赏。俩人的相遇相知，可谓之为“神交”。

三、身居乡梓 心忧天下

左宗棠非常感谢陶澍的知遇之恩。在陶澍逝世之后，左宗棠把陶澍接到陶澍老家安化小淹，一住就是8年。

在这8年期间，左宗棠把陶澍像亲生儿子一样相待，将自己的学识逐步地教给他，另一方面，也广泛涉猎了陶澍丰富的家藏书卷，再次精心研读了《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者魏源，是中国19世纪初著名的思想家，曾经作过陶澍的顾问。在他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大部分文章的内容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魏源的思想代表了他那一时代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他们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的兴起，深切感到在官僚、腐败的剥蚀下，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削弱，清朝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康熙、乾隆时期的雄伟气魄。当时中央政府的白银储备也日趋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000万两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800万两，清朝的绿营军在多年的养尊处优生活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魏源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把保卫边疆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成为关注的焦点。

左宗棠的思想深受魏源的影响，这同左宗棠身处新风气最盛的湖南也有很大的关系。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就是湖南人，曾任江苏布政使，被左宗棠尊为老师。他与陶澍同为当时最著名的省级官员，试图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30年代在清朝暮气沉沉的行政官僚制度上进行一些实际的改革。在湖南，经世致用学说得到了他们的关注。经世致用学说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的文人们不能再整天钻在故纸堆里，把精力耗费在对国家毫无用途的语言学和词源学上，以应付科举考试来求得一职半官。学是为了用，学识应用于行政，研究前人的知识是为了对国家面临的新问题作出反应，通过改革来加强国家的实力。

在小淹的这8年和后来在柳庄居住的几年，是左宗棠生涯中最为平静安宁的十几年。他潜心读书，似乎十分安心于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并写下这样的诗句：

柳庄二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左宗棠和朋友们饮酒赋诗，煮茗论文，纵谈古今。他们以当今奇士自居，与三国时的诸葛亮相比。左宗棠自称今亮，胡林翼自称老亮，郭嵩焘自称小亮，被并称为湖南“三亮”。

但是，田园式生活自娱自乐貌似逍遥的表面，掩藏不住他那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他对日益逼近祖国的内忧外患深感不安。这从左宗棠当时写的两首诗中就可窥见一斑：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元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汗。
西域环兵不计算，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宫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有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19 世纪初期以来，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衰落。政治日趋腐败，整个统治阶级集团奢侈腐化，“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现象满目皆是。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一路寻欢作乐，劳民伤财。地方官收缴田赋时，在法定的数额之外，还要加收“火耗”，以充填其私囊。官府将征收的散碎银子重新入火加工铸造，炼成银锭，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称为“火耗”。道光年间，这种“火耗”一般都在 10% 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40%~50%。各级官吏巧取豪夺，贪污成风。

清朝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柱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和全国各省区的驻防。清朝的军队也逐渐腐化。崇尚武功、强悍勇猛的八旗兵，入关之后，承平日久，武事荒废，疏于操练，饮酒作乐，暮气沉沉。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日显落后。

土地兼并成为全国普遍现象。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占田规模很大的大地主。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占地 80 万亩；嘉庆年间，广东巡抚白龄占田 50 万亩；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竟占田达 200 多万亩。在湖南地区，约有 50%~60% 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户之手。随着土地的集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当时的地租率一般在 50% 以上，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趋衰微没落的时候，欧美的资本主义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

17 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首先取得政权，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8 世纪中叶，英国以蒸汽机为先导，开始了工业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机器大工业阶段的飞跃。在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织布工厂。从 1770 年到 1841 年这 70 年间，棉纺织业的棉花用量增加了 100 倍。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轮船和蒸汽机车普遍使用，并带动了煤矿、钢铁和机器工业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在 18 世纪末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进入 19 世纪后，法国的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了机器。1815 年至 1840 年，法国的棉织产量增长了 3 倍，成为实力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在 18 世纪 80 年代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附属地位，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 世纪上半期，美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很快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机器生产数量超过欧洲各国。1850 年，铁路线长达 15000 公里，居世界第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本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需要了。开拓新的殖民地，寻求新的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成为各资本主义列强的目标。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张帆远航，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蠢蠢欲动，频频敲打着中国的大门，急于开辟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沙皇俄国则利于它毗邻我国的有利的地理条件，以陆路对我国进行渗透侵略。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

16世纪80年代，俄国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将领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在这以后，沙俄又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皇俄国这一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西北边疆虎视眈眈，磨尖了利爪，时刻准备趁机从我国攫取大片土地。

左宗棠虽然蛰居乡里，和老农为邻，与桑植稻菽为伍，看秧苗初茁，田水淙淙，草新土润，一片太平。但他时时关注着国事。朋友相聚，也总是纵谈国家朝政兴衰，天下大势。

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国家发生的一桩连一桩、一件连一件的令人忧心如焚的大事，使左宗棠如一弘池水一样的田园生活连表面的平静也维持不下去了。巨石投入深潭，掀起一波波浪涛。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为了给自己的鸦片贸易打开通往中国的通道，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力图用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6月，英国侵略军由48艘舰船和4000人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英国军队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威胁，也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化。以林则徐为首的抗英派受到穆彰阿、琦善等妥协派的反对和阻挠。

林则徐亲自焚烟抗英，成功地保卫了广州。消息传来，国人大振，左宗棠也不禁欢心雀跃。他通过老师贺长龄把自己写的《勤师篇》寄给了林则徐，为林则徐的禁烟思想和抗英斗争的胜利而高兴和颂扬。但是，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一直动摇于两派之间，使战争出现了三起三落的局面。最终由于清王朝的衰落和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使浙江的定海、香港接连陷落，虎门炮台失守，广州城被围，厦门和浙东的定海、镇海、宁波被攻占；英军接着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上海、宝山沦入敌手，镇江沦丧。在英国侵略军的步步进逼下，清朝廷卑躬屈膝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祖国的东南半壁失去了屏障，暴露于西方列强的铁掌之下。朝廷懦弱，任人欺凌。消息传来，左宗棠赋诗感时，忧愤难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左宗棠被泯灭不了的“匹夫”责任感苦苦地冲击着。欲投国，恨无门。左宗棠于无奈之中苦叹：“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但宗棠生在今世，时运不佳呀！”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0年），林则徐因年老体病，从云贵总督的任上回老家福州看病，途经长沙。在这之前，林则徐曾被遣戍到伊犁，在新疆办理开垦，受任陕西巡抚，对祖国的大西北有了许多实际的认识。

林则徐久闻左宗棠奇才之名，路过长沙时，特地派人到湘阴柳庄，请来左宗棠长叙深谈。在湘江舟楫之中，林则徐和左宗棠通宵不眠，直至鸡啼天晓，为左宗棠的深知灼见所倾倒。

林则徐在广州的时候，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组织人翻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以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人了解西方人、认识西方的先驱。

林则徐在长谈中，深切地指出“西北的重要，朝廷一直没有认识，将来会吃亏的。国家的心腹之患，沙俄是其中心之一。”

临别时，林则徐为左宗棠题写了一副联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四、出山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销的商品日益增长，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和长江流域及其腹地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清政府日益空虚的国库已经无法支付战费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索要的巨额赔款，只得用重税掠夺广大农民。这些，都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贵族也趁机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巧取豪夺。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地主所占的土地达到 88.3%，而农民只占 11.7%的土地。1846 至 1850 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东、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虫不断。灾荒连年，人祸天灾，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的困境、死亡的边缘。

1851 年，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领导下，饱受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为壮烈的农民起义斗争的序幕。

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占领了金田村以东约 15 公里的大湟江口，准备在这里经过水路转入更广阔的区域，向桂林进军。在这里，太平军遭到了清军的进击和围堵。太平军经过 8 个月的艰苦作战，在紫荆山区地带的狭小地区内东突西奔，终于从东北的山间小路突出重围，经过恩旺等地到达了蒙江上游的山域——永安（今蒙山县）。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使清朝廷得以有时间调集了 3 万多人的军队围住了永安市。1852 年 4 月，太平军突围北上，直逼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省的省会，清军守卫较严。太平军围攻了一个月没有攻克，移师向全州进攻。太平军攻下全州后，乘湘江水势上涨的机会，从水路进入湖南。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到江忠源募集的家乡湖南新宁子弟 500 人，号称“楚勇”的袭击。蓑衣渡水面狭窄，两岸林木茂密。江忠源伐木作堰，横江拦断，使太平军在此战役中严重受挫。太平军在永安时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近 2 万人。经过蓑衣渡的损失，进入湖南仅剩不到 1 万人。这一仗，是清朝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江忠源善战之名由此传遍全国。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先后攻克湖南南部重镇道州、郴州，在 9 月间进逼至湖南省会长沙。

此时湖南巡抚为张亮基，正为守城之事作难犯愁。清朝的绿营兵的腐败无能，在鸦片战争中就已暴露无遗。当时任厦门地方官的徐继畲这样描写清朝官军：“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那些从各地调来守卫长沙、抵御太平军的绿营兵，无事生非，强奸民女，强夺财物，聚众斗殴。这样的军队别说拉出去打仗，就是守城也很难放心。

就在张亮基满心忧虑，不知举措之际，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和江忠源不约而同地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与左宗棠均是朋友，彼此相知很深。胡林翼称赞左宗棠，说找遍九州，也没有见到才气比他高的人。江忠源则说，左宗棠为“人中之龙，其功名虽只一举人，然经纶满腹，才华横绝，当世少有。”更为难得的是，“长期潜心舆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张亮基听江忠源介绍了左宗棠的才干，

尚且半信半疑之际，江忠源提到抗英英雄林则徐对左宗棠推崇备至，视为绝世奇才。张亮基平素十分仰慕林则徐，遂下定决心请左宗棠出山。但是，左宗棠不贪财，不爱官，为人高傲，请他出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忠源附在张亮基的耳边，替他出了一个计谋。

这天傍晚，左宗棠的女婿陶恍家来了一队士兵，为首的队长把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交给了陶恍。信中说，长沙面临太平军的包围，十分危急，守城官军急需粮饷。陶家为湖南有名的富户，请陶公子5日内筹集10万两银子以供军需。随即把陶恍绑走了。

左宗棠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驱马赶到长沙城里的巡抚衙门搭救陶恍，张亮基和江忠源迎出衙门亲自迎接左宗棠。江忠源向左宗棠赔礼后，张亮基恳请左宗棠出山，协助他保卫长沙。左宗棠见张亮基十分诚恳，又是好朋友江忠源亲自推荐，终于答应出山。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左宗棠年近40，终于到了蛟龙出水、建功立业之时。

五、筹饷

长沙城的防守，有了左宗棠、江忠源的辅佐和调度，一改以往的混乱，调度有方，井井有条。张亮基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一片愁云又上心头。

防守长沙城的那些外省绿营兵，一进城就公开扬言：“老子是拿性命来守城的，当官的不给银子，老子就不给你守。”当官的更是整天骂骂咧咧，要物索钱。

长沙城里国库中凡是能动用的银子都拿了出来给这些绿营兵开了军饷，朝廷的饷银眼瞅着到期无望。张亮基整天愁得苦着脸，食不甘味，寝卧不宁，却毫无良策。饷银接不上，军心必定涣散，不等太平军攻城，长沙城里就会不战自乱，其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张亮基万般无奈之际，左宗棠向张亮基提出了向长沙城里的豪富借饷，以解燃眉之急。

这天，长沙城里巡抚衙门宴客厅里摆下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出席者均为长沙城里的首富，主人是巡抚张亮基，左宗棠作陪。

酒过三巡，就在客人兴致正浓之时，张亮基提出以巡抚名义向各位借十万两白银，以渡长沙城的难关。

一提借钱，那些豪富立时哑了口，缄默不言。冷了半天场，那些豪富才一个个慢吞吞地开了口，均以时逢战乱，生意不佳，拿不出钱来为借口搪塞。

左宗棠不畏豪富，终于为张亮基筹来救长沙城防守之急的 12 万两白银。

太平军攻城失利后，改变了战略方向。他们从岳麓山下的地主老财手里取得了七八万斤的粮食，挥师移营转进。张亮基派出 5000 人马，包抄围堵太平军石达开部 3000 人，以图歼灭其部，扰乱太平军的军心，将太平军赶出湖南。不料，尾追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向荣所率的 1000 人马，在水陆洲被太平军的伏兵用火攻烧了个片甲不留，死伤八九百人。准备南北包抄的两支清军，听说水陆洲向荣军溃败，魂飞胆丧，虽率 4000 余众的人马，却敌不过石达开的 3000 人，交战无几，大败而逃。

左宗棠站在长沙城头，看着城外火光冲天，绿营兵一溃千里，心里万分鄙夷这样无能之辈。他暗下决心，今后如果有机会率军，要亲自选择将官，重新招募士兵，好好训练，一定要彻底剪除绿营兵的恶习，方能称雄于战场。

六、官场风云

长沙城解围之后，张亮基欣喜异常，立时申报朝廷：一是请朝廷立刻拨来兵饷，偿还借长沙城里豪富的 12 万两银子；二是赶紧向朝廷起草奏章，向朝廷邀功请赏。在叙录守长沙的功劳时，左宗棠由知县升为同知直隶州。

太平军放弃长沙之后，向西行进，经宁乡攻占了益阳。在洞庭湖边，他们得到了数千条民船，使之回过身来越过洞庭湖占领了岳阳。在洞庭湖畔，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入起义队伍，组成了太平军水师。

1852 年底，太平军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攻占武昌。

1853 年 2 月，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不到一个月，放弃武昌，由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杨秀清亲自统率大军，浩浩荡荡蔽江东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当涂等地。3 月，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水陆连营，一望无际。19 至 20 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和内城，占领南京。太平军随即以南京为都城，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

在这段时间里，张亮基接旨到山东做了巡抚，左宗棠又回到他的湘阴柳庄隐居起来。

1853 年 5 月，太平军为了巩固和发展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分兵北伐和西征。西征一开始，太平军就开始了争城夺地的战争。首先在安徽占领了安庆、合肥，在江西同清军激烈地争夺南昌，随后撤围北上，占领九江。1854 年，太平军又进入湖北，再度占领武昌。同年，再次攻入湖南。

接替张亮基做了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几次亲赴湘阴柳庄，请左宗棠再次出山。左宗棠不好意思一驳再驳巡抚大人的诚意，再次出山，入巡抚骆秉章的衙署做了幕僚。

左宗棠为人忠直，不避嫌疑，即已答应了骆秉章，就把衙门内的公事视作自己的当然责任，事事过问，桩桩关心。凡左宗棠经手的事情，件件有落实，有条不紊。骆秉章倚重他为左右手，事事征询他的意见。幕僚们在议论军事时，都要问：“季高（左宗棠）先生是怎么说的？”因此，尽管左宗棠在衙门里只是个幕僚身份，却在同僚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朝廷同太平军的战争还在继续，筹兵筹粮筹款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大事。湖南虽然是鱼米之乡，但除了要对付进攻湖南的太平军，还要应付临近几省兵事所需，使偌大一个湖南省，兵饷的缺口也很大。同时，百姓的税赋日益沉重，怨声载道。当时的湘潭县，税政收入一年就得 4000 两，整个湖南省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左宗棠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把他所学的经世致用之学拿出来实践，写出了整顿财务的意见书，得到骆秉章的首肯。左宗棠实行了减漕粮，定军需、公费等章程，使农民减轻了赋税数百万两，长沙藩库却增加了上千万两的收入。在左宗棠的经营下，仅两年多的时间，长沙藩库从存银 22 万两到 3000 千两出头。左宗棠的官职也由此升至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

左宗棠的改革，断绝了一些贪官污吏的财路，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不仅妒忌的人日益增多，诽谤的议论也从四面八方传出。况且左宗棠心高气傲，为人耿直，是个从不掩饰感情的人，情绪一上来，就不顾一切。入官场前的多年，他一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朝廷的腐朽、官场的丑恶和那些官僚们的无能，看得非常清楚，并且深恶痛绝。因此，左宗棠快刀斩乱麻、敢做

敢为、不避嫌疑的工作风范，终于激起了一场官场风云。

1856年，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发生内讧。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太平军内部的一场大屠杀。

首先，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从不出户”，脱离了太平军广大将士。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小集团，并各自控制了一部分军队。随着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的骄傲专横日趋膨胀，竟然逼洪秀全亲自到他的东王府，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表面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却秘密下令要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和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火速返回天京。韦昌辉返回天京后，趁此机会下毒手杀死了杨秀清及其眷属、部下2万多人，在天京开始了血腥屠杀。石达开返回天京，责备韦昌辉的滥杀，石、韦之间的矛盾又公开化。在太平军广大将士的要求和石达开所率部众的进逼下，洪秀全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经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心有疑忌，与石达开的矛盾公开化，迫使石达开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一带，后进入四川。

湖广总督官文接到皇上旨令，奉旨派永州镇总兵樊燮入川剿灭石达开所率的太平军。樊燮入川路经长沙，在巡抚衙门拜见骆秉章时吹牛皮说大话，与左宗棠起了言语冲突。樊燮是满清贵族官文的姻亲，他添枝加叶向官文告了左宗棠一状。打狗还得看主人，官文不分黑白，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状告左宗棠为“劣幕”，说他把持湖南，为非做歹。

文宗皇帝接到这个奏章，大为吃惊，随即在奏章上批道：“若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消息传到武昌，左宗棠的好朋友、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忙信告郭嵩焘和曾国藩等人，设法在京城打通关节和底下营救。

消息传到长沙，左宗棠愤恨交加。他不顾骆秉章的再三挽留，以赴京会试为名，辞别了巡抚衙门，回湘阴小住几天之后，带着一个仆人，冒着严寒，乘船赴京，躲避长沙官场是非之地。

郭嵩焘也是湖南人，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至交好友。当时他正在京城南书房供职编修，就请与他共事的最有名的翰林探花潘祖荫执笔上书皇上。

潘祖荫才华横溢，文采极好。当他听郭嵩焘原原本本地道来官文状告左宗棠的始末，不由怒从心起，十分恼火满清权贵妒贤嫉能的那般嘴脸，立时挥毫写下一篇折子。

潘祖荫从“湘勇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由骆秉章供应调度有方，而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写起，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最后写下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传颂千古的佳句！

潘祖荫的折子送达咸丰帝手里后，曾国藩、胡林翼的回奏折子也抵到皇上手中。曾国藩、胡林翼二人均夸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战胜攻取，调度有方，为人臣刚明耐苦，忠于职守，名满三湘”，劝皇上以国家为重，起用左宗棠这一将帅之才。清王朝围剿太平军已经10年有余，绿营军溃败无遗，朝廷正值用人之际。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已成为清朝廷镇压太平天国倚重的力量，光复失地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曾、胡、左等人的身上。咸丰帝下诏左宗棠以四品京官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回湖南募勇，建立新军。

七、“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

此时的左宗棠，虽仅是一个四品官，但他的才能和干练，已经名震湘、鄂、赣、皖诸省，声达天庭。

早在官文诬告之前，左宗棠就已名声赫赫。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御史宗稷辰向朝廷推荐人才，左宗棠的大名就显列在首位。每逢两湖有人进京，咸丰皇帝都会问及左宗棠，一天，咸丰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郭嵩焘，再次谈及左宗棠。郭嵩焘借机历数左宗棠的才干，也替左宗棠抱屈好文章换不来功名，难有更大的作为。咸丰帝对郭嵩焘说：“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孰重，我看功业比功名更重一重。你写信传我的话，年岁已经不年轻了，再错过就更精力衰退了，应当及时出来为我剿办贼寇。”胡林翼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高兴地说，左宗棠“梦中远求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有希望出头了！”

实际上，左宗棠只是在官文诬告一案之后，才真正有了出头的机会，崭露自己的帅才。在此之前，左宗棠仅是一个充当幕僚的文官，虽然运筹帷幄自如，但难以实现许多军事战略谋划，空自嗟叹。

太平军的西征部队在湖北战场连胜之后，攻入湖南，于1854年4月再入岳阳，整个湖北，大半又落入太平军的控制之下。紧跟着，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率领湘军驻扎在长沙城外的水陆洲附近，伺机与太平军西征部队一战。是先消灭靖港之敌，还是收回湘潭，聚议战计时，曾国藩的部将众说不一。许多人听说靖港太平军水陆统算只有500人，都主张先打了靖港一役再说。惟独左宗棠一人提出异议，他主张集中兵力先攻下湘潭，切断太平军南路。曾国藩举棋不定，最后决定他亲自率一部由水路北上靖港出战太平军水师，其他部将率师南取湘潭。不料曾国藩在靖港中了太平军的埋伏，500人的太平军变成了2万人的队伍，将湘军打得大败而逃，曾国藩自杀投水被救。左宗棠力主的湘潭之战，湘军却水陆大获全胜。

太平军在靖港的胜利，并没有挽回湘潭失败所造成的局势，被迫放弃了钳制长沙消灭湘军的计划。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却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于7月重新出动，一举攻占岳阳。

曾国藩私下与其弟国荃谈及此事，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左宗棠字）为冠。”

如今，左宗棠能亲自率军征战，宿志可酬，声名可显，因此欣喜异常。兴致所至，挥笔写下了力敌千军，气概非凡的诗篇：

频率兵气缠湖湘，杳杳郊垌驱豺狼。

会缚湘筠作大帚，一扫区宇净氛垢。

归来共枕沱江眠，卧看寒云归谷口。

左宗棠虽豪情满怀，却也不是盲目乐观。入官场前的多年，他一直在乡村务农，深知百姓疾苦。他知道太平军的起事，是由于走投无路而被逼上梁山，其战斗力非同小可，而且又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虽然太平天国天京内乱损失了两位太平军的将帅，石达开又远走黔桂，面临着内伤重创和瓦解的局势，但洪秀全将经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太平军将领提拔到领导岗位，组成了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年轻将领为各军主将的新的领导核心。征战之险，致胜之难，千难万险，还在前头呢！

左宗棠回到湖南，招募了湘勇5000人，号为“楚军”，精心训练，严明纪律，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军队，并选拔了王开化、王开林、刘典、杨昌浚

等人才派作统将。

1860年秋，已任两江总督的湘军统帅曾国藩，连发数信，催促左宗棠率楚军速进江西，攻援浙江。10月，左宗棠率军进到江西景德镇一带，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上报朝廷，将两江总督的驻节放置在皖南的祁门县。太平军与湘军在皖、赣一带摆开了战场。

此时，李秀成率领10万人挺进赣北，与左宗棠的楚军在景德镇一带激战；李世贤攻破徽州；曾国藩两江总督府的驻地——祁门，成了前线。忠王李秀成的太平军打到离祁门只有60里路的地方，离曾国藩的大营真是“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左宗棠率楚军在江西和安徽边界上游走，窥测有利时机，以抓住战机解祁门之围。

太平军分兵三路向祁门包围过来。李世贤带着千万人马从江西进攻。拟从南面攻打祁门，遭到了左宗棠的顽强抵抗。左宗棠凭着5000人马，在乐平城东南一连三次大败李世贤，顶住了数倍于他的太平军的进攻。在乐平被围之际，左宗棠抓住风雨大作、雷电交加的有利时机，率部冲出乐平城，分三路进攻围城的太平军，一下子把战机抓在手里。大雨滂沱，睁眼一片迷蒙，太平军被楚军打得措手不及。从山上奔下的山洪急流，把太平军的队伍冲得七零八落。李世贤损失了1万多人马，一直退到浙江省境内的常山、开化。太平军从南路进攻祁门的计划流产了。

这场战役后，朝廷顺曾国藩所请，先后授予左宗棠帮办江南军务，太常寺卿等职，官至正三品。从此，左宗棠跻身公卿之列。

正当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中下游迅猛发展，清王朝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英国于1856年发动了对华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法国也派兵与英国联合参战。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然后继续北上。1858年5月，英、法军舰攻陷大沽炮台，沿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兵临北京城下。清政府屈辱求全，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两国借口换约之机，提出无理要求，再次挑起事端。清政府的首脑咸丰皇帝幻想妥协求和，一再谕令清军“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抗局”，导致清军守卫力量无法相互援手，未成拱卫之势，被英、法联军各个击破。大沽炮台再次失手，天津被占领，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通县城西的八里桥失守，北京危在旦夕。

咸丰皇帝派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负责向英、法侵略军求和，自己则率后妃、皇子和一些王公大臣仓惶逃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英法联军进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疯狂地在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抢劫了3天，离开时纵火焚烧了这座罕见的文化宝库，大火数日不息，园林变为一片废墟。

在英、法武力压迫和沙俄诱逼下，奕訢按照咸丰皇帝“委曲将就”的谕旨，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各国对清政府的影响。

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承德行宫，年方6岁的儿子载淳继位。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得了清朝廷实际的最高统治权。慈禧太后上台后，调整了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天京外围的江南、江北大营的溃败，已长久证明依靠绿营兵剿灭太平军的无望。慈禧太后懂得，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镇压太平军，必须依靠有能力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曾国藩的湘军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就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

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

曾国藩深识左宗棠的才能和干练，保举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官至二品，让左宗棠率军进入浙江，以抵御李秀成、李世贤所率太平军在浙江战场上的猛烈攻势。

1861年4月底，李世贤率军由江西入浙江，沿途连败清军，到10月间先后攻克金华、义乌、丽水、承德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率军进兵，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12月底，太平军攻占杭州，巡抚王有龄兵败自杀。同月，重要港口宁波也被太平军攻占。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近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1862年初，左宗棠在皖南调遣部队，准备粮饷，为准备攻打浙江的战事做了充足的准备。2月中旬，他率部由婺源越过白沙关入开化，派部进援孤守衢州的清军，与李世贤所率的太平军接战，两军先相持于江山、常山一带，又相持于衢州、龙游一带。几经争夺，左宗棠才把遂安拿下，赢得一个确保衢州的局势。左宗棠自从与李世贤所率太平军接战以来，互有胜负。进入浙江以来，左宗棠一改过去的作战方针，以稳进不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付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的战术特点，对属下的各统领一再告诫“慎以图之”。

6月，左宗棠进驻衢州，把此地做为浙抚的指挥中心。紧接着，左宗棠派兵分军进攻龙游、寿昌、兰溪、汤溪，孤立金华。

10月，李世贤奉洪秀全之命，率7万精锐部队驰援天京后，浙江太平军力量顿时薄弱。左宗棠乘机加强攻势，于1863年3月攻陷金华，沿钱塘江而下，直逼富阳、杭州。守卫杭州的太平军在主力北上的情况下，急忙收缩兵力，将各部聚于富阳、余杭一带，守住杭州的南大门和北大门，死守杭州，遥卫天京。1863年5月，清朝廷授左宗棠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把福建的军务也交给了他。

攻下杭州，就是彻底扫除了太平军的浙江根据地，为曾国荃所率湘军最后攻破天京奠定了基础。为此，左宗棠做了精心的部署。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把一部摆在祁门方向，一是加强曾国藩部湘军的防守，二是防备皖北地区的太平军；另一部驻在开化、淳安一带，阻击江西方向来的太平军。鼎足而立，万无一失，这才打响了攻打杭州的战斗。

杭州一仗，从1863年春拿下萧山打富阳开始，到1864年3月攻陷杭州，历时一年，太平军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守城战斗。

1863年春，左宗棠率楚军就开始了围攻富阳的战斗。围城5个月，未能将富阳拿下。左宗棠借师助剿，与法国侵略者训练的“常捷军”协同进攻，于9月攻下富阳。杭州的南大门洞开，陷于左宗棠的攻击之下。11月，左宗棠在富阳召集各路将帅议战，分析了杭州的地形和太平军的兵力后，定下了同时进攻余杭、杭州，使两城无法互为犄角的战略。

在杭州的争夺战中，太平军坚韧不拔，楚军屡败不下，伤之严重，几次遭溃败。直到1864年3月，由于嘉兴被楚军攻陷，杭州的粮道和交通线都被切断，无法据守，守将陈炳文动摇出走，钱桂仁率部千余人献城投降，杭州城才被拿下。左宗棠获加太子少保衔。其余的太平军转移湖州。8月，左宗棠主部攻陷湖州，受封为一等恪靖伯。

1864年7月，曾国荃的湘军攻破天京。守城太平军抱着与天京共存亡的决心，与冲进城的湘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谱写了最

为悲壮的篇章。

李世贤在江西听到天京已破的消息，与唐王汪海洋率部转移到福建，相继攻克汀州、漳州等城，建立了根据地。清政府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派左宗棠督楚军从江西、浙江分道攻入福建。1865年5月，左宗棠攻陷漳州。汪海洋将李世贤杀害，引军入江西，大败跟踪追剿的清军，然后疾行南下，突袭广东梅州，攻下州城。左宗棠奉命以广东督师，急调各路清军前来包围，一举拿下该城。1866年2月，左宗棠在广东梅县黄沙嶂消灭了太平军余部，使江南太平军的斗争以悲壮牺牲而告终。

八、开船厂 办学堂

在左宗棠率楚军屏蔽江南，在鄂、赣、浙一带与太平军作战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消息传来，圆明园付之一炬，咸丰皇帝被逼走承德，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失败。左宗棠在征战行军途中，积愤忧心，常常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堂堂中华，竟至一败如此吗？他恨透了那些只知当官拿银子，凡事都做不成的绿营官兵。当将官的莫不锦衣玉食，娼优歌舞，士兵则多抽鸦片，嫖赌成风，士气溺惰，军营糜烂。况且，那些落后的大刀长矛和土造大炮，怎抵得过洋人的洋枪洋炮？这几年，楚军和湘军用大批银子购置了一些洋枪洋炮，才在与太平军攻城掠地的战斗中略占上风。在攻打富阳时，不得不借助法国海军少尉德克碑训练的、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常捷军，才得以拿下城池。没有德克碑的大炮把杭州城的城墙轰开一个约 35 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杭州城的收复更是无日可待。攻城时，那些洋炮都成了宝贝。西方史学家在研究清王朝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获胜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之一是“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左宗棠一直认为，借师助剿不是一件妥事。由外国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弄不好就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而且这些外国军官及其带领的中国士兵，所主要关心的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疯狂地掳掠财物，残害百姓，官府也难以约束。左宗棠在给朝廷上奏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惟是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转眼之间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贻中土至艰之饷，而貽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1864 年，湘军拿下天京后，左宗棠就解散了常捷军。

此时，左宗棠才真正体会到他所最推崇的人物之一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意。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口号的人之一。他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图“自强”。很可惜，他的呼声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响，也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

时隔几十年，魏源的话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左宗棠到此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法国人德克碑所率领的常捷军给左宗棠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感性知识，使左宗棠深切地感到：中国这一古老的帝国，闭国已久，自强已息；放眼海外，这个古老的大国已经没有强大可以依恃了。划自强之策，振中华雄风，就一直成了左宗棠朝思暮想，萦绕心头的一件大事。

左宗棠率楚军攻下杭州后，就把他的闽浙总督衙门府移到了杭州。战事稍松，他就聘请德克碑、日意格做助手，帮他试造小火轮。左宗棠曾经在长江边亲眼看到挂着英国国旗的轮船，傲首鸣笛，迎风破浪，箭一般地从下游驶往上游，将湘军水师的百条木船遥遥抛在身后，那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使他深受刺激。自造铁甲炮船、建立自己的海防一事就成了左宗棠的心中夙愿之一。

德克碑、日意格雇工匠仿造了 3 艘小火轮。在杭州西湖试航的那一天，

请来左宗棠观看。只见小火轮呜呜鸣笛，不用船夫摇橹划桨，在平静的西湖水面上南来北往，鼓起的水浪拍打着湖岸，左宗棠心里十分高兴。美中不足的是，驶行不速，难以作战，还不能照此生产，于是暂时终止了这项计划。

1866年，左宗棠率部在闽、粤消灭太平军余部后，将闽浙总督衙门府移驻福州，造船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左宗棠让署藩司周开锡造出详细预算。经他概算，造船需选建船厂，一年需银60万两，以5年计，约需300万两才能见到第一艘船下水。所需银款之巨，实在惊人。左宗棠立即将兴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上书朝廷，奏请朝廷拨款。

一纸奏文到了京中，在满朝文武之中引发了买船、造船之争。上海《申报》的一篇报道，形象地描述了这场争论的来由和各自主张：“福建议造大船，朝野舆论大起，誉之者：兴家爱国，匹夫有责；毁之者：忧其难于有成，议其糜费甚多。”

曾国藩的学生，靠自筹淮军、协佐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当时官至署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出于官场的派系斗争的考虑，请英国使节威妥玛和英军赫德上校出面游说慈禧太后，说轮船器械以购雇为方便。朝中的保守派也趁机借此事攻击左宗棠，坚决反对在福州建海军船坞，开办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得知此事，怒从心起。自己动手造船，可以一兴百兴，发展国家的机器制造业，兴旺强盛可由此而来。花大价钱购雇洋人的船，自己始终不会制造，仍将受制于人。左宗棠深夜挥笔疾书，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纵横海上，彼有舰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天下事始有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盛，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资，数世之利也。”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朝廷中主张自强的两个主要倡导者恭亲王和文祥的支持，也得到京师一部分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的支持，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得以实施。

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局，建在福州东南闽江口内的马尾港，因此又叫做“马尾船政局”、“马尾造船厂”。他聘法国人日意格为监督，雇洋人工匠，依照洋人的管理方法，制造舰船。这个厂后来成为清代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从1866年到1907年，共造大小船舰约40艘，同时，还制造了各种军备器械，像大炮、枪械等。

有了自己的船，就要有自己的人来操作驾驶，行船作战。有了先进的船炮，还需要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军事人才。左宗棠事事当机立断，在筹办福州船政局的同时，开办了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的招生广告在福州城里掀起了波澜，有100多名14岁以下的学生通过考试入了学堂，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左宗棠在学堂建成伊始，把学堂命名为“求是堂”，后改为船政学堂。希望学生们经过5至7年的严格的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着成为舰长、大副的年轻人能够掌握驾船航海、守卫海防的本领。

船政学堂借福州西湖荷花池旁边的一块绿茵茵的草地，举行了开学典礼。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莅临庆典大会，作了慷慨激昂的训话，把国家自强的深切希望寄托在莘莘学子身上：

“年轻的中国人，恭贺船政学堂成立，恭贺你们成为中国的第一批海军。自强之道，以培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希望你们努力学

习，建好海军，保卫海疆！”

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第二年，左宗棠把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习法文，学造船；后学堂学习英文，学驾驶；两个学堂都学习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和包括物理学、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

船政学堂的学生中人才济济，学堂的教学卓有成效。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的接任者沈葆楨在 70 年代上疏朝廷得以批准之后，把船政学堂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够“循序而渐进”，窥西学的“精微之奥”。

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师和船长，也使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这些学生更进一步地传入中国。在船政学堂前前后后的十几届毕业学生中，有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在船政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后被送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内容包括了进化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是把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入中国的第一人，对当时的先进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还有中国第一个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亲自主持勘测、修筑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铁路建筑工程师，在我国铁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船政学堂为中国的近代海军培养了第一批高级将领，其中有代理北洋海军提督，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率北洋舰队奋勇作战，兵败自杀殉国的刘步蟾；有“致远”舰舰长邓世昌、“经远”舰舰长林永升。

左宗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者之一，并开创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先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左宗棠对近代中国的落伍挨打原因的认识只囿于船不坚炮不利，因而十分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而没有探求到中国落伍衰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没落，因此，纵然左宗棠志再大，才再高，也无法挽救清王朝必然覆亡的命运。

九、剿捻镇回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从陕西回师到鄂豫皖边界的一支太平军因天京的陷落而非常沮丧，其中一个主要领袖扶王陈得才绝望地自杀了。但另一个主要领袖遵王赖文光却联合了这一带的捻军，与皖北捻军的领袖张宗禹、任化邦携手，又把农民战争的火焰在长江以北，东至山东，西到陕西的广大地区内燃烧起来。

1865年初，清朝名将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骑兵在山东进剿捻军。捻军采用运动战术，一日驰数百里，使僧格林沁疲于奔命；再选择有利战机和地点，狠狠打击僧军。1865年5月，捻军把僧格林沁的主力引到山东荷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于寨外河堤之后，一举全歼僧军马队，僧格林沁阵亡。捻军声威大振。清政府惊慌地发现，捻军已成为朝廷新的大敌，急调湘军和淮军进剿。曾国藩、李鸿章相继被任为进剿山东、河南捻军的统帅。1866年，捻军在河南许昌分军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为东捻军；另一支由张宗禹率领，挺进到陕北，为西捻军。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1867年2月，他被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受令负责进剿西捻，镇压回民起义。

从1862年起，在西北的陕西省、甘肃省和宁夏、青海的东部，许多回民和汉民杂居的地方爆发了回民起义。在陕西、甘肃的辽阔地区内，回民到处一呼百应地起来，反抗清政府歧视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随着斗争的发展，西北回民起义形成四股较大的势力；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甘肃临夏马占鳌部、青海西宁马文义部、甘肃酒泉马文禄部。

左宗棠深知到西北边远地区行军作战，粮饷难筹难运。仗怎么打，战略怎么定，左宗棠心中还没有策划好。左宗棠带着3000人马乘船从福州马尾港一路北上，一路上都反复思考着这几个决定全局胜负的大问题。船队一到汉口，左宗棠就和先期到达的刘典、王柏心聚论了几天，决定了陕甘之战的基本打法：“先秦后陇”、“先捻后回”，分割西捻军与回民军的联合，次第解决。

左宗棠为了解决粮饷问题，提出兵屯之举。兵屯，意味着战争不好打。一进兵，一接仗，就要耗尽地方钱粮。如果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地方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接济不上的。如果靠朝廷，西北边陲路途遥远，一时也难以为继。如果断了粮道，那就前功尽弃。左宗棠决定取屯兵渐进之策。将各路军营中筛汰出来的老弱残之兵勇留下屯田垦荒，攻克一处，屯田一方，留下的兵勇虽少一些，但军粮可省，兵精将勇，后方稳妥，实为久远之计。

至此，左宗棠定下战争方略，遂上书朝廷，请求皇上宽以岁月，取屯兵渐进的打法。左宗棠立下军令状：“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伏恳皇上假以方便，宽以五年，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以罪，以明军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派员采购口壮良马，又派官僚买办胡雪岩打通上海海关，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支白银120万两充作军饷，同时急电催促各巡抚衙门解往西北的饷粮赶紧上路。1867年6月，左宗棠分兵三路入陕。12月，西捻军由陕北渡黄河急援东捻军，直到保定，威胁清朝的首都。左宗棠因此受责，朝廷圣旨“严加议处”，因作战不利被革职留任。他率部5000人尾随追击至保定后，把军队分成近防、进剿和防剿三大部分，前者驻固安、

涿州，拱卫北京；二者驻保定、河间、天津，屏障北京；三者是随进随剿，三管齐下，围追堵截。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打法，命左宗棠总统河北、山西境内各军防堵，与总统山东各军的李鸿章相配合。1868年8月，西捻军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被封锁围困，终至全军覆没。清廷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再次令他回陕专力进攻回民军。左宗棠于1868年10月从西安出发，分路进剿起义的回民武装。

回民起义军的基本群众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百姓，但其领导者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如马化龙是个封建主，又是宗教领袖；马文禄是清朝的军官，而且是各自分股活动。左宗棠于是采取了“先抚后杀”各个击破的策略。

1869年4月，左宗棠攻陷陕西回民军根据地。6月进驻泾川，发兵攻打马化龙部根据地金积堡，久战不胜。第二年，左宗棠令楚军决秦渠水灌淹金积堡，马化龙投降。1871年8月，左宗棠移驻静宁，分兵三路进攻马占鳌部回民根据地临夏。第二年春，马占鳌投降。1872年8月，左宗棠移驻兰州，分兵攻取西宁。1873年春，他增兵围攻马文禄部回民军根据地酒泉，屡遭挫败，炮轰、挖地道、爬濠均不奏效。后因回民军粮尽，马文禄开城投降。至1873年，左宗棠已经把陕甘的回民起义大体镇压下去了，为进军新疆打开了至关重要的通道。

十、海防塞防之争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 2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唐朝时，中央政府就在新疆地区先后设置了行政单位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东起阿尔泰山，西抵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及额尔齐斯河上游；南达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广大区域。1755 至 1759 年，清乾隆皇帝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改两域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城”，从此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1760 年，清政府正式在伊犁设官驻兵屯田，使荒凉空虚的伊犁河逐渐充实和兴盛起来。1762 年，清政府正式设立总统伊犁等处的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伊犁成为统辖新疆的首府，“天山南北总会之区”。清政府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政权，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先后从内地和南疆迁移大批兵民去伊犁地区屯田游牧。

沙皇俄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吞并了我国东北边疆 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又把黑手伸进我国的西北边疆。1860 年，俄国强使清政府接受的《北京条约》中有一条就是关于西部边界的。随后，清政府和沙俄各自派出官员在新疆塔城会晤，进行西部边界的谈判。在清政府既定的妥协退让政策下，清朝政府的谈判代表所能做的事，就只能在沙俄提出的划界草案上签字。沙俄就这样又从中国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侵略成性的沙俄并不甘心就此罢手。

1864 年，新疆爆发了维吾尔、回等各民族人民的反清起事，斗争很快扩展到天山南北两路。这些反清武装的领导权很快被一些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控制，在新疆各地区实行封建割据，建立了许多小朝廷，以“排满、反汉、卫教”等口号蛊惑人心，制造民族分裂，相互争战不休，在天山南北建立了 5 个封建割据政权，给沙俄侵略者提供了可趁之机。

喀什噶尔（今喀什）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为攻下喀什噶尔的汉城（今疏勒），向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求援。这就给了浩罕汗国的野心家阿古柏入侵的机会。浩罕派阿古柏率武装于 1865 年初侵入南疆，攻下汉城后，开始逐步兼并南疆其它地区。1867 年，阿古柏建立哲得沙尔（意为“土城”）汗国，自立为汗。1870 年，他又进占乌鲁木齐、吐鲁番，消灭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封建政权，占领了南疆的北部和北疆部分地区。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阿古柏对南疆的统治完全是一幅血泪斑斑的图画。俄国间谍普瓦热瓦尔斯基曾经到过阿古柏占领区，认为在“现今的南疆是很难生活的。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都没有保障。”

阿古柏为了维持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用出卖中国领土的主权为交易，争取沙俄和英国的支持。当时英、俄两国正在激烈争夺中亚地区。俄国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英国想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国插手。新疆成为它们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英、俄两国争取表示支持阿古柏，力图控制他，以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

地理位置优越的沙俄以先下手为强的姿态，采取了蛮横的武力侵略政策。1870 年，沙俄派兵强占了中国的穆札尔持山口，扼制了伊犁通往南疆的咽喉。1871 年夏天，当阿古柏势力伸入北疆时，沙俄出兵强占伊犁，夺取了

中国西部边疆战略要地。当地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与敌人拼死战斗达 50 多天。1872 年，沙皇派代表团到喀什噶尔，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条件获得了许多权益，包括在南疆通商、访问、设立商务专员、对进口货物抽 2.5% 的进口税等。1874 年，英国也与阿古柏订立条约，通过承认他的统治地位，换取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通商、英商在南疆交易只交纳 2.5% 进口税的特权，英国人还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区的所有部分。

清政府命署理伊犁将军荣全赴伊犁与俄方交涉，荣全要求俄方归还伊犁，俄方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提出重划中俄边界和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谈判毫无结果。而且，沙俄进一步扬言，说要准备夺取乌鲁木齐。

就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以头白临边、垂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重重困难，毅然提出承担收复新疆的重任，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1833 年，年仅 22 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成组诗《燕台杂感》，就谈及对新疆的“置省、开屯、时务”等规划。1871 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的扩张已进一步升级，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

1873 年春，左宗棠在给清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方略，要“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要撙节使用，统一各军专饷，“相其缓急，均其多寡”。

1874 年，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1875 年，就在左宗棠平定陕甘，准备用兵新疆时，朝廷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辩论。对此，清廷内部疑虑重重，意见纷纷，举棋不定。与此同时，英、俄两国也在伺机进行分裂我国领土的活动，以达到瓜分新疆的目的。英国以阿古柏的保护人身份进行所谓居间调停。英国驻华公使竭力劝说清政府不要出兵，应承认阿古柏政权使新疆南部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用以阻挡沙俄势力向南发展。沙俄如果遇不到什么阻力，就一定会从它已经占领的伊犁出发，进而占领新疆北部。

朝廷中议论海防、塞防之争的大臣大多认为，自清高宗乾隆帝平定新疆后，每年驻防要花军费数百万两，实在是一个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全力供给西征军，可以说是一种失策，应该按照英国人的议论，允许阿古柏独立成为中国的藩属，这样可以停止西征，集中全力筹办海防。李鸿章全力主张这一点。李鸿章借口“海防、西征，力难兼顾”，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就会愈益严重，要求停止西征，“即匀作海防之饷。”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刑部尚书崇实上奏，居然说新疆即使收复，也“万里穷荒，何益于事？”这一派人名义上力主“海防”，实则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官僚借此打击左宗棠，以扩大本集团的势力。

1875 年 4 月，左宗棠上了一道约 5000 字的奏折，力排众议，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反驳说：“陕甘新近平定，不乘此时机及时收回去国家失去的土地，而把它割弃让其另外建立一个国家，这是自找麻烦。万一阿古柏政权不能守住新疆，不是西被英国人并吞，就是北被俄国人收入版图。这等于是坐在家把国土送给别人，把边关要地丢失。边防兵员不可减少，军饷照常开支。否则不但无益于海防，而且会挫伤国威，造成祸乱。”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文祥的支持，他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为左宗棠争辩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涉，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能在新疆打胜仗。

清朝廷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才最终下定决心，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1875年2月，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

十一、驱逐外寇 保卫新疆

收复新疆战事的艰难，犹胜于平定陕甘。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土地广袤，少数民族众多。天山南部是农业区，天山北部是草原世界。千里戈壁，茫茫荒原，水源寥寥，人烟稀少，没有粮产；沙漠中的绿洲，虽然水美草肥，宜于耕种，但面积小，相互之间相隔甚远。高大的天山山脉横亘新疆东西，成为一座难以翻越的天然屏障。

新疆战事的物质准备，要难于陕甘之战千百倍。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相当困难。左宗棠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筹粮、筹饷、筹转运之上，尤其重视节兵裕饷。

为广筹军粮，左宗棠分南、北两路加紧采办。北路在归化设“西征采运总局”，在包头设分局，派杨昌浚到马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开辟粮源，南路主要指河西走廊甘州（今甘肃酒泉）一带，从1873至1875年，共在这里采粮47.5万石。左宗棠还利用英、俄两国的矛盾，从俄国购得一批粮食。同时，左宗棠也开始了屯田。他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1874年，张曜率先头部队进驻哈密，就依左宗棠之令关外屯田。张曜军兴修水利，屯垦戍边，每年收军粮几万石。

有了粮，还需要运。关边万里，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长途运输谈何容易。从甘肃武威至酒泉900里，酒泉至嘉峪关玉门360里，玉门至安西又是200里，再到哈密，一共3000来里。光是安西至哈密的11站路，千里之遥，全是戈壁，一无粮，二无安居之民，三无可使用的骡马，四无可用的车辆。粮要费大力气从远地运到酒泉屯足，然后再费更大的力气更远的地区转输供应。西出阳关，不仅无故人，而且无故道。人粮、驼粮、马粮的沿途消耗是所运粮的2倍。一石粮运到哈密，要耗去两石粮。左宗棠向当地老乡打听，虚心向长途跋涉的商人求教，终于找到了到归化、包头以及宁夏的一些地方去购粮，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巴里坤，这个近几十年商旅所走之路。为了辗转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5000辆大车、29000峰骆驼和5500头驴骡。

在军需物资的供给方面，左宗棠也做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依靠胡雪岩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在汉口设后路粮台，转运上海军需；在西安又设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1870年创设的甘肃制造局和1875年建立的兰州火药局，就近为他供应军火。

筹粮、筹运难，筹饷更难。清政府的财政已是艰难竭蹶，要打仗却拿不出钱。左宗棠一年的军费支出约需银800多万两，实际只能收到500多万两。为摆脱窘境，他上书朝廷请求举借外债以充军费。在胡雪岩的斡旋下，1877年终于从英国汇丰银行借到500万两，分7年偿还，以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押。另外，清政府从户部的海关税中拨出200万两，并命各省限期3个月尽先解银300万两，才解决了军费的难题。

除了以上的准备工作，左宗棠还通过整顿、集训、改善武器装备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出征新疆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为保卫新疆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876年4月，左宗棠从兰州抵达酒泉，在这里设置大本营，就近指挥。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总兵力约7万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计80多个营，近4万人。1876年夏季，左宗棠拉开了驱

逐侵略者，收复新疆的战斗帷幕。

左宗棠的大军以刘锦棠部为先锋，在 1876 年首先向天山北部进兵，同阿古柏手下的白彦虎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夺取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各地。北路告捷后，阿古柏十分恐慌，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派精兵屯扎天山的重要孔道、通往南疆的门户达坂城和托克逊、吐鲁番盆地，自己亲自坐镇喀什噶尔。1877 年春夏之交，左宗棠部署军队转向南路，迅速攻下吐鲁番、托克逊、达坂等地，重创了阿古柏的有生力量，打开了通向南疆的大门。阿古柏兵败自杀，他的儿子伯克胡里为争夺继承权杀死兄弟海古拉，和白彦虎逃往南疆。1877 年，左宗棠的军队在南疆扫除了叛乱分子，占领了众多城池，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光绪皇帝下诏晋升左宗棠为二等侯。

1878 年，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收回伊犁问题。崇厚怯懦无能，在沙俄的威胁下，与沙俄签订《交还伊犁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付兵费 500 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增辟陆路通商路线，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等。消息传来，朝野哗然，纷纷谴责崇厚卖国。左宗棠上奏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厌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清政府遂将崇厚治罪，判为“斩监候”，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谈判，同时授命左宗棠做打仗准备。

1879 年 5 月，左宗棠以 67 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抬着棺材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在左宗棠积极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有了进展。1881 年 2 月，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前条约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占有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清人杨昌濬 1879 年写的一首七绝。这首诗热情赞颂了左宗棠率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也讴歌了实现这一壮举的最高统帅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玉门关外左宗棠率大军栽下的绵延几千里的杨柳，绿叶婆娑，向后人诉说着左宗棠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以后的 5 年中，左宗棠曾四次上奏朝廷，要求在新疆建省。左宗棠这一宿愿，在他去世后几个月终于实现了。经过几十年的人间沧桑，新疆建省对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性才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左宗棠青年时代就怀有远大理想，一生忠贞报国。收复新疆，让新疆回归祖国怀抱，是左宗棠为祖国做出的最大贡献。诚如曾国藩所述：“国幸有左宗棠也。”

1881 年 2 月，清政府命左宗棠管兵部事务，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后又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84 年，法国侵略军进犯台湾、福建，左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885 年 7 月，他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固海防。不久，他再次因病请求引退。8 月，在福州去世，享年 73 岁，朝廷赠太傅，谥号“文襄”。

